

清代女性文人结社 与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

李玉栓

摘要 中国古代的女性文人结社从明中叶开始起步，至清初康熙年间正式形成，雍正、乾隆间持续发展，嘉庆至咸丰间达到鼎盛，同治以后迅速衰落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文人结社有着从血缘型到地缘型、从师缘型到人缘型的清晰的演进轨迹。女性文人组织大量集会结社既是清代女性文学繁荣的表征之一，同时也是促进清代女性文学发展的动因之一，在选本、题跋、诗话、论诗诗等领域都为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关键词 结社 女性文人 女性文学 文学批评 清代

作者李玉栓，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234）。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06-0146-10

中国古代女性从事文事活动最早可溯及《诗经》中的许穆夫人，此后代不乏人。但在明代以前，留存姓名和作品的女性作家总体上并不是很多，她们撰写的文学批评著作更为寥寥。从明中叶开始，这种局面逐步改观，而整个清代无论女性作家还是她们所作的诗文别集、理论著作都是数量激增，成为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一大奇观，至有“闺秀之诗词文可录者约三千余家”^①的说法。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古代女性文人结社的发展轨迹也大体若是，特别是从明中叶以后女性文人结社开始迅速兴起、至有清一代蔚为大观的景象，更是与女性文学的发展状况高度契合。^②

对于这一现象，学界关注比较多的是女性文学或者女性文人结社的单一方面。在女性文学方面，谢无量、梁乙真、谭正璧等几位大家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已给予足够重视，^③ 21 世纪以后更是蓬勃兴起，文献整理、理论研究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对于女性文人结社的研究关注比较多的是以某一结社个案或某一地区社事，或在吴藻、汪端、顾若璞、沈善宝等清代重要女性作家的研究中涉及她们的结社活动。^④ 对女性文人

① 陈荭：《小黛轩论诗诗叙附记》，陈芸：《小黛轩论诗诗》卷首，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 2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年，第 1521 页。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亦言清代女性作家“超轶前代，数逾三千”，胡文楷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5 页。

② 按，本文所言“女性文学”是就作者身份而言，专指女性创作的文学，包括别集、选集、总集、序跋以及诗文评类著述等，在论述过程中会涉及一些男性作家书写女性的作品，但不妨碍本文对于“女性文学”的总体界定。所言“女性文学批评”亦如是。

③ 参见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16 年；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 年；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北京：光明书店，1930 年；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上海：开明书店，1932 年。

④ 主要有吴晶：《蕉园诗社考论》，《浙江学刊》2010 年第 5 期；袁志成：《从闺内吟咏到国外结社——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突围之路》，《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程君：《清代道光间秋红吟社考》，《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陈雅娟：《清代常州才女结社唱和研究》，《江南论坛》2017 年第 6 期等，以及近些年来出现的十余篇硕博学位论文。其中，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首次将江南女性的结社分为家居式、社交式和公众式，莫立民《清代女子诗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分别从客体和本体两个方面对近 30 个清代女子诗社及其诗歌创作进行了细致考察，是对清代女性文人结社的宏观性研究。

结社的演进轨迹进行历时梳理的成果尚不多见，而从宏观上探讨女性文人结社与文学批评的关系的成果更是很少见到。鉴此，本文拟将中国古代女性文人结社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清代女性文人结社与女性文学批评的联系予以揭橥，从中可以具体而微地看到结社在女性文学理论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文人结社像其他各种事物一样，也遵循着发生、发展、壮大和衰变的普遍规律，先后经历了魏晋的萌芽、隋唐的形成、宋元的发展、明代的繁盛、清代的新变和晚清至民国的转型。^①但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总体上的概括，而且一定意义上只是对男性文人结社发展历程的总结，并不能代表各种女性社事，这是因为女性结社的兴起、发展和演变虽然与男性文人的结社活动有着密切关联，但它的演进轨迹却与男性文人结社完全不同。从总体趋势上看，中国古代的女性文人结社在明代中期才开始起步，至清初康熙年间正式形成，雍正、乾隆年间持续发展，嘉庆至咸丰间达到鼎盛，同治以后迅速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文人结社有着从血缘型到地缘型、从师缘型到人缘型的清晰的演进轨迹。

一、女性文人结社的形成

中国古代的女性结社可以追溯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其时基于私社形成的邑义、邑会、法义等佛教类结社广为盛行，女性结社也是其中一种。当时她们的结社被称为优婆夷邑、优婆夷社，至五代宋初则径称为夫人社、女人社。女性可以单独结社，证明她们“有一定的经济独立性、一定的经济能力和一定的经济地位”^②，对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自我认同感有着促进作用，为后代女性开展群体性活动作了有益探索。不过，彼时女性结社要么是为了“普及法界众生，有形之类，一时成佛”“舍此秽行，杲〔早〕登天堂”^③的崇佛奉法，要么是为了“危则相扶，难则相救”^④的结义互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都无关乎文事，还不能算是“女性文人”的结社。明中叶以后，心学流布给社会带来个性解放思潮，一方面逐步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也改变了社会对于女性的普遍观念，使得女性公开参与甚或组织群体活动成为可能，“不但读书人们要立社，就是仕女们也要结起诗酒文社，提倡风雅，从事吟咏”^⑤。再加上全国结社之风的带动、文学世家的推动以及一些知名男性文人的促动，使得女性文人终于一步一步从闺内吟咏走向闺外结社，并最终融入到整个社会的结社运动中。

大约在明代弘、正之际，女性开始进入到男性文人的社事活动中，形成士女共社的现象。当时苏州顾璘所结青溪社就是“士女清华，才俊翕集”^⑥，嘉靖以后，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如嘉靖十三年（1534）武功康海六十大寿，“召名妓百人为百岁会，各书小令付之”^⑦；万历十四年（1586）歙县汪道昆主盟杭州南屏诗社，“出名姬十二人督诗”^⑧；崇祯九年（1636）秀水姚瀚在南京召国门广业社第三集，“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⑨，等等。可以看到，这些女性基本上都是才妓名姬，都是被男性召进社中，在社事活动中也只是奏乐演曲、舞裳侑酒，最多是展稿督诗，显然还处于附属地位。但这种士女共社的模式为后来女性文人结社提供了借鉴，是女性文人社团的直接源头之一。

明清之际，以家族为纽带的闺媛淑女开始广泛组织集会唱和活动。其中，吴江叶氏、桐城方氏、会稽祁氏最为著称。吴江叶氏群体以叶绍袁的妻子沈宜修为核心，钱谦益曾描述她与族内闺秀的唱和活动：“宛君（沈宜修字）与三女相与题花赋草，镂月裁云……于是诸姑伯姊，后先娣姒，靡不屏刀尺而事篇章，弃组紃

① 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研究·绪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页。

② 孟宪实：《试论敦煌的妇女结社》，《敦煌吐鲁番研究》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9页。

③ 佚名：《武定三年（545）五月八日郑清合邑义六十人造迦叶像记》，转引自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篇》，东京：国书刊行会，1980年，第267页。

④ 敦煌文书S.527：《后周显德六年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转引自杨森：《晚唐五代两件〈女人社〉文书札记》，《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

⑤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8页。

⑥ 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7，清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

⑦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4，清嘉庆五年湛贻堂刻本。

⑧ 汪道昆：《太函集》卷76《南屏社记》，明万历刻本。

⑨ 余怀：《板桥杂记》下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而工子墨。”^① 桐城方维仪寡居清芬阁，与大姊方如耀、堂妹方维则经常吟哦阁中，“白首往来，商量文学”^②，并誉“方氏三节”，方维仪的弟媳吴令仪及令仪之妹令则也经常参加唱和，合称“桐城五姊妹”。会稽商景兰孀居三十余年，组织了频繁的文学活动。商氏描述她与女儿、儿媳的活动说：“长妇张氏德蕙，次妇朱氏德蓉，女修嫣、湘君，又俱解读书，每于女红之余，或拈题分韵，推敲风雅，或尚溯古昔，衡论当世，遇才妇淑媛，辄流连不能去。”^③ 这一时期，类似的闺秀诗群还有云间张氏、嘉兴黄氏、嘉定董氏、归安叶氏等，都是“以工诗词于世”^④ 的家族型才女群体。这些群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聚会的方式开展集会吟咏，是女性社事中最为原始的一种形态。不过，她们此时还没有明确提出结社诉求，更没有实际的结社行为，可见她们的结社意识还没有完全形成。

这种血缘型女性群体的唱和活动，在入清以后逐渐突破家族壁垒。会稽祁氏一门，在商景兰的带领下文事臻于极盛：“夫人有二媳四女，咸工诗，每暇日登临，则令媳女辈载笔床砚匣以随，角韵分题，一时传为胜事。”由此就吸引了其他异姓女子前来加入：“闺秀黄皆令入梅市访之，赠送唱和甚盛。”^⑤ 黄皆令（名媛介）在祁家寓留一年之久，与祁氏闺阁高吟低唱卓为频繁，商景兰就曾描述她们隆冬之际一起游山探梅：“一色溯天寒气老，万重山壑暮云开。梅花远径魂无主，明月当轩梦不来。”^⑥ 如果说黄媛介只是家族女性群体中零星出现的非本族女性的话，那么山阴吴氏、王氏、朱氏三个女性群体联合开展的集会赋诗活动，就完全突破了家族的限制。顺治十二年（1655）元宵节，吴国辅继室胡紫霞招邀女伴于浮翠轩社集赋诗。此次社集，诸人均有诗作。黄媛介“握尘同仙侣，开筵值上元。才华推时学，风雅集梁园”，胡紫霞“挹榭迎仙珮，清光满上元。高才同道蕴，逸致等东园”，王端淑“上元逢雅集，诗律重开元。丽藻归彤管，逍遥拟漆园”^⑦，都对此次聚会赞颂不已，乃至与西汉梁园雅集相媲美。当时参与活动的至少有祁氏家族中的祁德琼，王氏家族中的王静淑、王端淑姐妹，朱氏家族中的赵东玮、陶履坦妯娌，以及秀水才女黄媛介、云间名妓张婉仙等，望族闺秀、寒门女史以及楚馆才妓共赴一会，血缘关系已不再是召集诗友的衡量标准，这就使得地区性文学群体的出现成为可能，为女性社团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康熙年间，女性文人结社有了实质性的发展。民国间清晖楼主说：“至有清一代，闺阁之中，名媛杰出，如蕉园七子、吴中十子、随园女弟子等，至今犹脍炙人口。”^⑧ 首列“蕉园七子”，即是康熙年间杭州地区的一个女性文人群体：“（林以宁）与同里顾启姬、柴季娴静仪、冯又令、钱云仪凤纶、张槎云昊、毛安芳娉倡‘蕉园七子之社’，艺林传为美谈。”^⑨ 诗社以“蕉园五子”“蕉园七子”为核心，前后延续将近三十年，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仍余音未绝。《杭郡诗辑》记述她们的活动场面：“季娴独漾小艇，偕冯又令、钱云仪、林亚清、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笈，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⑩ 近人梁乙真撰写《中国妇女文学史纲》更是大力称颂：“终清之世，钱塘文学，为东南妇女之冠，其孕育滋乳之功，厥在此也。”^⑪ 在蕉园诗社中，各成员之间既有血缘关系，也有地缘关系，已经由闺内吟咏向闺外结社转变，是女性文人结社由血缘型向地缘型过渡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社事。同时，蕉园诗社也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有名有实的女性文学社团，在中国古代文人结社史上地位居首，所谓“自来闺秀之结社联吟，提倡风雅者，当推蕉园

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753页。

② 沈善宝：《名媛诗话》卷3，《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70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73页。

③ 商景兰：《锦囊集·琴楼遗稿序》，祁彪佳：《祁彪佳集》附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89页。

④ 徐珂：《近词丛话》，唐圭璋辑：《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221页。

⑤ 阮元：《两浙輶轩录》卷40，《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84册，第473页。

⑥ 商景兰：《同皆令游寓山》，王端淑辑：《名媛诗纬初编》卷11，清康熙六年清音堂刻本。

⑦ 黄媛介：《乙未上元吴夫人紫霞招同玉隐、王玉映、赵东玮、陶固生诸社姊集浮翠轩，迟祁修嫣、张婉仙不至，拈得元字》，胡紫霞：《上元雅集同黄皆令、王玉隐、玉映、赵东玮、陶固生咏》，王端淑：《上元夕浮翠吴夫人招，同黄皆令、陶固生、赵东玮、家玉隐社集，拈得元字》，王端淑辑：《名媛诗纬初编》卷9、卷12、卷42。

⑧ 清晖楼主：《清代闺秀诗钞序》，胡文楷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附录二，第927页。

⑨ 完颜恂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卷4，清道光十一年红香馆刻本。

⑩ 吴颢、吴振：《国朝杭郡诗辑》卷13，清光绪二年杭州丁氏刊本。

⑪ 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民国丛书》第二编第60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385页。

诸子为盛”^①，正是对这种地位的肯定。

二、女性文人结社的发展

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治理，文化逐步繁荣，思想观念特别是女性观念日趋进步，女性结社由此得以持续发展。如侯官许琛“与闺秀廖淑筹、庄九畹、郑徽柔、镜蓉、黄淑窈、淑畹，结社倡和，诗学益进”^②，阳湖刘琬怀与诸昆仲及同堂姊妹常聚集红药丛中“分题咏物，填有长短调六十阕，名《红叶阕词》”^③等，这些诗群仍然是建立在数量众多的家族女性群体之上。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从事文学创作的家族女性群体有六十组以上，而清代将近五十组，^④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两地，仅吴中地区的七大望族就有诸多女性诗人：“于计则栢生、阮芝、清涵、琴史以及芝仙、心度、南初、青昧、七襄、小娥、蕊仙、芸仙；于邱则心香、宛怀、翠寒、紫烟以及镜湖、菊秋、葵仙、颂年、宝龄、双庆、兰卿、锄经；于宋则柔斋以及香溪、珠浦、琅腴、玉遮；于周则葆文、畹兰、兰娟、咏之；于柳则蓉塘、翠峰；于王则倚云、佩言；于吴则柔卿、安卿、允卿。”^⑤

在这些群体之中，乾隆后期以“吴中十子”为核心的苏南地区女性诗人群最具代表性。她们所结社事名为清溪吟社，又称“林屋十子吟社”“吴中十子社”等。社中成员江珠曾吟赞她们的社事：“香奁小社，拈险韵以联吟；花月深宵，劈蛮笺而酬酢”，“接瑶席而论文，宛似神仙之侣；树吟坛而劲敌，居然娘子之军”^⑥。其社诗总集《吴中女士诗钞》（一名《吴中十子诗钞》）经任兆麟阅定后刊行于世，与稍后袁枚所编的《随园女弟子诗选》堪称双璧，论者以为“清溪吟社，与随园相犄角”，“所谓吴中十子者，近媲西泠，远绍蕉园，洵艺林盛事”^⑦，将她们与顾之琼、张藻等人相与媲美。清溪吟社是清代地缘型女性社事的代表。满族女诗人恽珠在记述社事时，说吴门张允滋“与同里张紫繁芬、陆素窗瑛、李婉兮嫩、席兰枝蕙文、朱翠娟宗淑、江碧岑珠、沈蕙孙瓊、尤寄湘澹仙、沈皎如持玉，结清溪吟社，号吴中十子”^⑧，着重强调了“同里”关系，说明社中成员已经以地缘关系为主。而据社中成员江珠所说，当时大家都尊奉张允滋为“金闺领袖”：“远近名媛，诗筒络绎，咸请质焉。”^⑨也就是说，清溪吟社的活动实际上并不局限于“吴中十子”，而是当地才女闺媛们共同的“香奁吟社”，地域色彩已经非常鲜明。据今存《吴中香奁吟社草》所载，当时参与结社吟诗的除张允滋等人外，至少还有王悟源、张蕴、叶兰、周澧兰等17人，^⑩这可以在《吴中十子诗钞》的诸多诗题、小注中找到印证，从中正可看出一个更大规模的地域性女性诗人群体的存在。

如果对清溪吟社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再进一步加以辨析的话，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血缘与地缘共生的社事，同时师缘的关系也若隐若现。社中张允滋与张芬为堂姐妹，朱宗淑为张允滋表侄女；陆瑛与李嫩为姑嫂；尤澹仙与沈持玉为表姐妹，表明在这个地缘型的社团里还保留有血缘、亲缘的影子。至于师缘，这个“师”就是“金闺领袖”张允滋的丈夫任兆麟。任兆麟对妻子与各位名媛的诗词唱和非常支持，不仅亲选妻子作品为《清溪诗稿》，还经常给社中其他女子指点文字、命题课诗和评点定品，李嫩就曾受其亲教：“是日心斋先生（任兆麟）至，阅拙稿，为窜正几字”，江珠“常与心斋先生论诗”，张芬的诗稿得其披阅：“（张芬）尽检其篋中所作贻清溪（张允滋），清溪乃以视余（任兆麟）……特发而观之”，张允滋选好《吴中女士诗钞》更是请其“阅定”，任兆麟自己也说：“闺阁之以诗文质者，至数人之多”^⑪。说明任兆麟不仅是“十

① 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第二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页。

②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4，《施淑仪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02页。

③ 缪荃孙：《国朝常州词录》卷28，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99页。

④ 参见李贵连：《试论明清女性文学创作主体的家族化及其根本原因》，《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⑤ 柳亚子：《松陵女子诗征序》，费善庆编：《松陵女子诗征》，吴江费氏华萼堂1918年刻本。

⑥ 江珠：《青藜阁集序》，《吴中女士诗钞》之《青藜阁集》。

⑦ 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民国丛书》第二编第60册，第416—417页。

⑧ 完颜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卷16。沈善宝《名媛诗话》卷4有相同记载。

⑨ 江珠：《采香楼诗集叙》，任兆麟辑，张滋兰选：《吴中女士诗钞》，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⑩ 详见沈起凤：《吴中香奁吟社草》，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

⑪ 李嫩：《晴窗偶书呈心斋先生》；江珠：《清溪诗集题辞》；任兆麟：《两面楼诗稿叙》；任兆麟：《吴中女士诗钞叙》；任兆麟：《晓春阁诗集叙》，分见《吴中女士诗钞》之《琴好楼小制》、《清溪诗集》、《两面楼诗稿》、卷首、《晓春阁诗集》。

子”的益友，也是她们的良师，诸女亦多以“先生”呼之，师缘型社事已露出端倪。可以说，清溪吟社实际上是一个地缘、血缘、师缘同时存在的混合型社团，在清代女性文人结社发展中的过渡性特征极为显著。

女性诗人为了提高诗艺，往往主动拜访名师以求指点，也有很多男性诗人会尊重女性，通过诗词唱和、撰序题跋乃至开门收徒对女性诗人进行点拨和奖携。任兆麟曾列举清代以来著名文人与他们的女弟子：“闺阁中不少亲师取友之辈，若昭华（徐媛昭华）之于西河（毛太史奇龄），素公（吴媛綃）之于定远（冯文学班），采于（张纂）之于西堂（尤太史侗），若冰（徐媛暎玉）之于松崖（惠文学栋）、沃田（沈征士大成），芷斋（方媛芳佩）之于霁堂（翁国子照）、菴浦（杭侍御世骏），其尤焯著者。”^①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师缘关系为纽带的女性诗人群体。其中，规模与影响最大的当推乾隆时期袁枚的随园女弟子群体。袁氏诗主性灵而行为放诞，说其“风流好色”^②，系出有因。但他尊重女性尤其对女性为诗的态度颇值得肯定：“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③因此他在自己的《随园诗话》中对女子诗事颇为留心，数量多达 180 余条，^④清初至乾隆间诗媛多所论列，即使是片言只句亦采录不遗。晚年以后，袁氏干脆广开门墙招收女性弟子，“以诗受业随园者，方外缁流，青衣红粉，无所不备”^⑤。这些女弟子跟随袁枚进行赋诗课词、集会研艺，其中乾隆五十五年（1790）和五十七年（1792）的两次湖楼诗会，一直为人所道。^⑥随园女弟子群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时人即称袁枚所到之处女子能诗者“皆敛衽及地，以弟子礼见”^⑦，她们的诗作如“日落烟霏霏，渡头行客少。山月出林迟，幽禽归树早”“积水一庭白，梨花寒不寒？东风扶病魂，遍绕雕栏杆”“寂寂园林日未斜，一庭红影上窗纱”^⑧，等等，也都沾带着“性灵”气息。嘉庆元年（1796），袁枚选刻 28 位女弟子作品为《随园女弟子诗选》，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女性诗群的影响。随园女弟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明确以师缘为纽带结成的大型女性诗人群体，她们已经完全突破家族的限制，也不完全局限于地域的圈囿，是带有一定派别特征的师门型群体，属于清代性灵诗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团史、诗歌史上都有着重要位置。

三、女性文人结社的鼎盛

自嘉庆以后，女性参与社事或自行结社已成风气，出现了中国古代女性文人结社的巅峰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事的地域覆盖面非常广泛。除了江南的江苏、浙江两地外，全国的其他地区如京师、天津、安徽、广东等地都有社事出现。例如，金匱杨芸与长洲李佩金“俱从宦京师，结社分题，裁红刻翠，青鸟传笺，乌丝界纸，都中女士传为美谈”^⑨；莆田吴氏“大开诗社，以《红楼梦》事分得四题，各以七律咏之”^⑩；桂林韩琦“集酒旗诗社，第一题课酒旗，征闺秀吟咏”^⑪，等等。据今人考订，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共有女性社事 30 余例，占清代女性文人结社近乎半数，^⑫足见其盛。二是女性文人的结社意识逐渐增强。如阳湖张氏结有兰苔社、^⑬湘潭郭氏结有梅花诗社、^⑭沈善宝诸人在京师结有秋红吟社等。这些社事都有着强烈

① 任兆麟：《晓春阁诗集叙》，《吴中女士诗钞》之《晓春阁诗集》。

② 王英志：《袁枚评传》第三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58—168 页。

③ 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补遗卷 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 590 页。

④ 参见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00 年，第 70—71 页。

⑤ 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补遗卷 9，第 806 页。

⑥ 参见袁枚：《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前跋》《后跋》，《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 年第 64 期。

⑦ 汪谷：《随园女弟子诗选序》，袁枚辑：《随园女弟子诗选》卷首，《丛书集成三编》第 35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 年，第 489 页。

⑧ 孙云凤：《晚溪》，金逸：《月夜》，骆绮兰：《千叶桃盛开题壁一绝》，《随园女弟子诗选》卷 1、卷 2、卷 3，《丛书集成三编》第 35 册，第 492、496、499 页。

⑨ 缪荃孙：《国朝常州词录》卷 27，第 867 页。

⑩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 9，《施淑仪集》，第 440 页。

⑪ 况周颐：《玉栖述雅》，唐圭璋编：《词话丛书》第 5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4611 页。

⑫ 参见张杰群：《清代女性文学社群研究》下编，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17 年，第 166—233 页。据该文考订，清代共有女性文学社群 71 例，其中明末至康熙年间 13 例，雍正、乾隆年间 16 例，嘉庆至咸丰年间 31 例，同治至宣统年间 11 例。

⑬ 参见沈善宝：《淡菊轩初稿序》，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四编上册，合肥：黄山书社，2008 年，第 627 页。

⑭ 参见郭佩兰：《元夕寄怀笙榆女侄》，郭秉慧：《留别杨畹香纫仙、张仙萼诸同社》，王继藻：《见梅花初开有怀郭笙榆姊》诸诗，郭润玉辑：《湘潭郭氏闺秀集》，清道光十七年刻本。

的结社意愿，都会给社事专门拟定名称，这显然不是一般性、偶然性的联句分韵、题咏雅集等所可比拟的，因为“结社有无名称，反映了当时社中成员结合意愿的强烈程度和群体意识的明确程度”^①，一定意义上，这要比结社数量增多、社事规模扩大等更能体现出社事的发展水平。

在这一时期，有两大社群颇值关注。其一是碧城仙馆女弟子群，是为师缘型社事的高峰。从嘉庆十二年（1807）开始，陈文述在常熟、崇明、江都等地为官，时常往来吴门、钱塘，他有意效仿袁枚广泛招收女弟子，共收有三十余人，^②其中以江浙地区最多，安徽、河北间亦有之。这些女弟子在陈文述的带领下校勘《西泠闺咏》、共咏西湖三女墓、编刊《兰因集》等，成为嘉道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她们也有意无意地举行一些集会，如道光六年（1826）为欢迎仁和吴藻至吴而举行的碧城墨会、道光八年（1828）为陈文述重赴汉皋而举行的邛江送别会等。其中，碧城墨会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聚会，“座中除沈采石外，皆碧城弟子”，这给吴藻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日后追忆说“江南忆，最忆碧城招”“墨会纪灵霄”^③。碧城仙馆女弟子是继随园之后又一个以师缘为纽带结成的大型女性诗人团体，在推动清代后期江南地区女性文学创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随园女弟子群相比，碧城仙馆诗群的门派意识更为明确，也更为强烈。陈文述给每一位入门女弟子都赠送一枚刻有“碧城弟子”的印章，女弟子们也无不自豪地宣称“我为碧城诗弟子”^④，颇有竖帜立派的意味，这与随园相比又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二是沈善宝诸人所结的秋红吟社，是为人缘型社事的典范。道光十九年（1839）秋，钱塘沈善宝在京师，“与太清、屏山、云林、伯芳结秋红吟社”^⑤。沈善宝撰有《名媛诗话》，多次述及社事，如道光二十年（1840）秋天，众人赏菊举会：“同里余季瑛集太清、云林、云姜、张佩吉及余于寓园绿净山房赏菊，花容掩映，人意欢忻。”^⑥社中主要成员顾春（即顾太清）对她们的社事也一直引以为傲：“深闺雅效群贤集，盛世能容我辈狂。”^⑦与此前的女性文人会社相比，秋红吟社的特点非常明显，是女性文人结社的再一次突破性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突破了血缘、地缘和师缘关系的限制。就沈善宝所说的五位成员，均无任何血缘关系，仅许延祚与钱伯芳稍带亲缘（钱伯芳为许延祚妹妹之姊），她们纯因趣味相投而联吟结社。参与社事活动的其他人员可能存在一些血缘、亲缘联系，但都不是结成社事的主要因素。这种以社会人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交型结社，实际上已经与当时多数男性文人所结的社事别无二致。二是挣脱了男性文人的笼罩。秋红吟社是女性文人独立开展的社事活动，社中不再有类似于叶绍袁、任兆麟、袁枚、陈文述等具有父亲、丈夫、好友或老师身份的男性文人介入，充分表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她们从事文学活动的自觉性，也使女性文学成为真正的“女性”文学。三是打破了明中叶以来江南女性文学活动一枝独秀的局面。秋红吟社的成员主要是随宦京师的女性家眷，所以她们社事活动的地点就在全国的政治中心，意味着女性结社突破了地域限制，开始从江南扩散到北方。这不仅扩大了女性文人的活动范围，而且可以借助京畿之地的巨大辐射性使女性文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更广更快的传播。四是破除了女性文学的民族藩篱。秋红吟社中不仅奕绘亲王的福晋顾春为满族，经常参与活动的棟鄂武庄、棟鄂少如、富察蕊仙、西林仙霞、完颜华香等均是满族。这种情况虽是基于满族统治的特定条件，但却促使秋红吟社的社事活动跨越了民族的同质性，显现出汉满同社、异族共会的特有景象。凡此种种，都可说明秋红吟社不仅是清代女性文人结社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女性文人结社的典范，是女性文人结社长期发展的结果。

如同男性文人结社一样，正当女性社事达到高潮的时候，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内忧外患，国事飘摇，传

① 李玉栓：《中国古代的社、结社与文人结社》，《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② 陈文述：《颐道堂全集·颐道堂戒后诗存》卷1《客有以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诗业图求售者为题四绝以当说法》诗注、卷9《题仁和钱蕊仙、女史凝珠遗诗》诗注，清道光间刊本。

③ 吴藻：《忆江南·寄怀云裳妹八首》，徐乃昌辑：《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花帘词》，清光绪二十二年南陵徐氏刊本。

④ 语出辛瑟婵：《题鸥波夫人碧城摘句图》，吴飞卿：《呈颐道夫子并题碧城仙馆诗集》，均见陈文述选：《碧城仙馆诗集》不分卷，西泠印社1915年铅印本。

⑤ 沈善宝：《名媛诗话》卷8，《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706册，第651页。

⑥ 沈善宝：《名媛诗话》卷6，《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706册，第622页。

⑦ 顾太清：《天游阁诗集》卷4，《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2页。

统的女性文人结社由此骤然衰落,全国各地仅见一些零星社事,如江阴沈珂、黄馥参与湘吟社^①、秀水金方荃结东湖消夏社^②、宜黄谢漱馨建晚香堂诗社^③等,这些社事多因资料匮乏今天已经难以知晓其具体情况。与此同时,伴随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兴办女校、推动女学成为时代共识,类似“女学乃当今急救本之始基”^④“欲强国必由女学”^⑤的思想言论屡见报端,时任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吕碧城更是大声疾呼女性同胞尽快“结成一完备坚固之大团体”^⑥,因而具有近代色彩的女性社团迅速兴起,她们所开展的活动大都在教育、政治、慈善或者风俗改良方面,^⑦传统的女性文人结社在急遽的时代浪潮之中完成了向现代社团的转变。^⑧

四、结社与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说,结社立会可以为“参与者提供开展文学活动的舞台和文学创作的契机”,可以“增进社中成员之间的交流,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从而促使他们创作出大量作品,^⑨文学批评也因此得以发展。清代女性在选本、题跋、诗话乃至新兴的论诗诗等各个领域都有着卓越表现,而这些表现都与集会结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在编选女性总集选集方面。明代以前女性总集选集的数量有限,而由女性自己编选的集子更是少之又少。这种状况从明代中期开始有所改观。^⑩吴江沈宜修将原有刻集者、未有刻集幸见藏本者、传闻偶得者以及笔记所载散见者共46位闺媛的诗词文辑为《伊人思》一卷,开创了中国古代女性编选才女闺秀作品的先河。《伊人思》中所收最多的是以家族唱和为核心的闺媛群体,如嘉兴黄媛贞、黄媛介姐妹,松江黄凤娴、张引元、张引庆母女,秀水黄淑德、屠瑶瑟、沈纫兰姑嫂等。这一方面反映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女性文学社群在当时的江南地区极为普遍,另一方面也是沈宜修崇奉群体唱和的观念在编纂中的体现,《伊人思》本身就收有沈氏自己的表妹张倩倩、亲家周慧贞等多位家族姻亲的女性才人。与此同时或稍晚,桐城方维仪也着手编纂女性诗集,“尝取古今女子之作,编为《宫闱诗史》,分正、邪二集”^⑪。方维仪编选女性诗歌的目的与沈宜修并不相同,但却与沈氏一道成为明代唯二的编纂女性总集选集的女性文人。入清以后,山阴王端淑仿《伊人思》体例辑选《名媛诗纬初编》四十二卷,上至后妃公主,下至才妓尼冠,乃至鬼狐淫女皆予收录,对于所收诗人诗作不仅有大量生平事迹的记述,而且多有自己独到的点评,显示出女性开展文学批评的趋势。自此女性编纂闺秀总集选集迅速发展起来,至晚清未有衰减。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清代由女性编纂或女性参与编纂的闺秀总集选集不下40种。^⑫《伊人思》《宫闱诗史》《名媛诗纬初编》这些女性总集选集的编纂者,都出自有着浓厚的诗教传统的家族,而且都开展过雅集唱和活动,显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说明了家风滋养和群体社集对于女性文人从事文学活动的推动作用。

其次,在赠写序跋题辞方面。撰写序跋题辞是古代文人传达文学观念、文学思想的重要方式。检视《清

①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10,《施淑仪集》,第492、493页。

② 叶恭绰:《全清词钞》,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76页。

③ 徐世昌辑:《晚晴簃诗话》卷19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48页。

④ 郑观应:《致居易斋主人谈论女学校书》,《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82页。

⑤ 梁启超:《变法通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96页。

⑥ 吕碧城:《女子宜急结团体论》,《中国女报》1907年第2期,第477页。

⑦ 据蒋美华《略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的解放心态》统计,辛亥革命时期共有女子社团35个,共分为“与教育有关的”“与政治运动有关的”“与谋职有关的”“与福利有关的”“与社会运动有关的”五种。见《江海学刊》1998年第6期。

⑧ 李玉栓:《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⑨ 李玉栓:《文人结社在文学流派发展中的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⑩ 综合诸家研究资料,整个中国古代的女性诗文集选集约有120部,其中明代以前不足10部,明代30余部,清代约80部。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女性总集选集均出现于中叶以后。参见胡文楷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附录二;陈广宏:《中晚明女性诗歌总集编刊宗旨及选录标准的文化解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1期;陈启明:《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研究》附录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等。

⑪ 光铁夫:《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卷1,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第24页。

⑫ 聂欣哈:《清嘉道年间女性的诗学研究》附录一,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2年,第339—344页。

代诗文集汇编》《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清代闺秀集丛刊》《清代闺阁诗集萃编》以及还在不断编印中的《江南女性别集》等大型丛书，清代女性别集的序跋超过 600 篇，虽其中大多数为男性文人所撰，但女性文人撰写的数量也十分可观。由女性文人撰写的序跋题辞在总体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家族内部女性亲属撰写。如钱塘顾若璞为其孙媳钱凤纶《古香楼集》撰序，阳湖张练英为其姊张縉英《淡鞠轩初稿》撰后序，桐乡严永华为其母王瑶芬《写韵楼诗钞》作跋等。二是社群交游者撰写。如李长霞给于修儒《静宜吟馆诗》作序、那逊兰保给完颜金樾《绿筠轩诗钞》作序、袁镜蓉给劳蓉君《绿云山房诗草》作序等，其中清溪吟社的江珠给社中张允滋《潮声阁集》、沈纘《翡翠楼集》、席蕙文《采香楼诗集》等一一作有序。三是女性文人自序自跋。如冷玉娟《砚炉阁诗集》、纪玘文《重刻近月亭诗稿》、佟佳氏《乌私存草》、白氏《绿窗诗草》等作有自序，思柏、宫淡亭《合存诗钞》两人分别撰序，于修儒自跋《静宜吟馆诗》，郝萱《秋岩诗集》既有自序也有自跋，等等。四是后世才女所撰。这以如皋冒俊为代表。俊字碧纘，咸丰、同治间人，“尝拟辑《古今名媛诗》，惜未果，后“校刊王玉焕、汪允庄、吴莘香、庄盘珠四集”^①，编为《林下雅音集》^②，并为之序，歿后由其夫陈坤刻行。所辑四人中，王玉焕（名采薇）系乾隆间人，庄盘珠（字莲佩）系乾隆、嘉庆间人，汪允庄（名端）、吴莘香（名藻）系嘉庆、道光间人，皆早于冒氏，既非宗亲亦不可能有所交游。这些女性文人撰写的序跋题辞涉及女性作家的家世生平、才德品性、交游创作、诗词特点、文学观念等，是清代女性文学理论的重要载体。而除第四类外，其他三类序跋都或多或少会叙及交游结社、集会唱和的情形。潘素心为她与黄素芳、黄连城唱和之作《平西唱和集》作序称：“家君昔日官广昌，余因得遇黄氏两闺秀，儒家女也，唱酬三载，得诗一卷。”^③纪玘文自序与其兄唱和：“予兄云谷穷经之暇，每有题咏，必索予和，兄未尝不作，予亦未尝不和。”^④那逊兰保在《绿筠轩诗钞序》中说完颜家族“亲党娣姐每相晤，辄不及米盐事，多以诗角，而要群伏太夫人”^⑤。这些记载也成为清代女性社群唱和的重要史料。

再次，在编撰诗话方面。明代之前女性撰写的文学理论著述除李清照《词论》外鲜少见到。明末清初方维仪、王端淑分别撰有《宫闺诗评》和《诗纬序论》，惜其存本至今尚未见到。入清以后随着女性文学的繁荣，女性撰写理论著述尤其是蔚为大宗的诗话越来越多。清代诗话丰富，其中明确为女性撰写的有 30 余种，^⑥一些著作如沈善宝《名媛诗话》、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汪端《自然好学斋诗话》等历来为论者所称。这些诗话大多与社群交游密不可分。例如在碧城仙馆女弟子群中，管筠与文静玉合选《碧城仙馆精华录》、汪端选编《明三十家诗选》、多位成员参编《西泠闰咏》等，在卷首凡例、诗人小传中多会品诗、论人、议事，进而提出诗学主张，颇类“诗话”，而王兰修、辛丝共著《国朝诗品》，则是“选国朝人诗宜登上品者，以年代相次，得二十余家，各为题词，并加论断”^⑦，更是典型的诗话著述。秋红吟社沈善宝撰写《名媛诗话》，是真正的女性撰写女性诗话，书中多次记述自己所结社事，并对清代以来的蕉园诗社、清溪诗社也多有记颂。血缘型社群中以嘉庆、道光间的丹徒王氏是为代表。这个家族女性群体以《江苏诗征》的编撰者王豫为中心，包括王豫妻子徐佩兰、妹妹王琮、长女王迺德、次女王迺容、三女王迺敬、外甥女季芳等，皆为一时才女，除徐佩兰“腹笥博洽，诗不多作”外^⑧，人人有集。其中王琮著述最丰，不仅有《爱兰轩集》《爱兰书屋正续集》《爱兰轩诗选》多部诗集，还辑有选集《名媛同音集》《曲江亭唱和集》，另撰《爱兰名媛诗话》。王迺德、王迺容除诗集外亦分别撰有《竹净轩诗话》和《浣桐阁诗话》。王豫在编纂《江苏诗征》时大量征引了上述三部诗话中的条目，足见对三部诗话的认可。清代中期以后女性诗文集以“家族式”的涌现有很多，但像丹徒王氏这样出现“家族式”的诗话著作则并不多见，究其因，实与王豫对诗论诗话的极

① 潘衍桐：《两浙轩续录》，清光绪刻本。

② 冒俊辑：《林下雅音集》，清光绪十年如不及斋刻本。

③ 胡文楷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附录二，第 937 页。

④ 纪玘文：《近月亭诗稿·自序》，清乾隆十九年刻本。

⑤ 那逊兰保：《绿筠轩诗钞序》，完颜金樾：《绿筠轩诗钞》卷首，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⑥ 参见聂欣哈：《清嘉道年间女性的诗学研究》附录二；吴永萍：《清代女性诗话研究·绪论》，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 年。

⑦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 8，《施淑仪集》，第 364 页。

⑧ 法式善撰，张寅彭、强迪艺编校：《梧门诗话合校》卷 16，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年，第 452 页。

大关注有关,同时家族内外的文学交游也不可忽视。例如王琼,与《澹仙诗话》作者熊琏“商榷酬和,时拟之林亚清、徐淑则”^①,与“吴中十子”“诗筒唱和最密,以所著《爱兰集》付刻于吟社集后”,与随园女弟子亦是“论诗投契,酬和极多”^②,还与仪征阮氏家族女性联合举行雅集酬唱,“一时名媛,如张霞城绉霄、毕智珠慧、孔经楼璐华、刘书之文如、江遥峰秀琼、侯香叶芝、张净因因、鲍菡香之蕙、张小谢少蕴,皆奇声定交,赓和盈秩”^③。后人评说王琼“与诸女士交,诗筒遍天下”^④或有溢美,但与江浙地区女诗人“诗筒往还,不下数十人”^⑤则当属实。正是这种长期的闺阁吟唱、社群交游、诗筒邮寄,使得女性文人有机会开阔眼界、接触其他才女,在积累大量资料的同时也逐渐形成自己的诗学观念,从而创作出诗话著作。

最后,在创作论诗诗方面。论诗诗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独特的批评形式,唐杜甫《戏为六绝句》、宋戴复古《论诗十绝》、金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皆为名作。清代论诗诗发展迅猛,并衍生出论词诗、论诗词、论词词、论诗曲等各种形式,而女性参与创作论诗诗,更是清代文学批评的新貌之一。据粗略估算,清代至少有上百位女性曾创作过论诗诗,^⑥仅“清代第一才妇”^⑦汪端一人就作有 130 多首。^⑧相较于男性所作,清代女性论诗诗有其自身价值。其一,从女性视角为女性诗歌发出更多呼吁。如方静云与后辈论诗作《与儿媳夏玉珍言诗》称“闲吟风雅绣余时,谁道诗非女子宜。不解宣尼删订意,‘二南’留得后妃诗”^⑨,那逊兰保给恩师作《题冰雪堂诗稿》称“国风《周南》冠四始,吟咏由来闺阁起。漫言女子贵无才,从古诗人属女子”^⑩等,都是将女性创作溯源于“五经”之首《诗经》,显有为女性诗歌正名之意。而汪端与诗友高簪论诗作《论宫闺诗十三首和高湘筠女史(其一)》云“汉代谁开典雅风?唐山文藻擅深宫。桂华都落房中乐,枚叔相如恐未工”^⑪,更是将唐山夫人的诗歌视作汉代文学开山,其成就甚或超过枚乘、司马相如,已将女性创作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这种为女性诗歌的呼唤反映出自明后期兴起的“女性”主体意识在入清以后得以进一步张扬。其二,继承和发展了诗歌理论。“性灵论”在清代女性诗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中就离不开女性论诗诗的标举。如多敏《与素芳女弟子论诗》“何必论唐宋,诗原写性灵”^⑫、王继藻《题李淑仪〈澹香阁诗草〉(其二)》“盥露几番吟不倦,爱他都是性灵诗”^⑬、戈馥华《学诗》“花红玉白描摹易,笔底还须写性灵”^⑭等。也有并未直接表明崇奉“性灵”的,但所论仍属“性灵”一脉,如宗粲《题沈竹斋太守夫人〈慈晖馆诗草〉》“文字流真性,难忘白发亲”^⑮、刘琬怀《夜坐与弟论诗即赠》“作诗如结交,要见肝胆真”^⑯等,这些都是性灵诗论在女性诗学中的发展。其三,保存了大量闺秀生活史料。由陈芸作诗、陈荭作注的《小黛轩论诗诗》堪为这方面的代表。全书论及清代女性诗人 1400 余人次、计诗 221 首,颇多涉及诗人交游、群体唱和、结社状况等,如论山阴祁氏闺秀群“梅市高才商景兰,楚纕赵璧妇姑欢”,论桐乡孔氏闺秀群“《丛桂稿》和《爱日草》,一门群从斗词华”,论福州“光禄派”闺秀群“派传光禄记吾乡,姊妹黄家草亦香”^⑰等,并在各诗之后对她们的交游吟唱事迹予以载录。因此,陈芸父亲就认为该书“其间大半意在传人传集,有清一代女文献十罗八九”^⑱,正道出其价值所在。论诗诗既是文学创作,也是文学批评,它不仅是清

① 王琼辑,王述庵选:《名媛同音集》卷 3,清刻本。

② 法式善撰,张寅彭、强迪艺编校:《梧门诗话合校》卷 16,第 420、444 页。

③ 法式善撰,张寅彭、强迪艺编校:《梧门诗话合校》卷 10,第 442 页。

④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 6,《施淑仪集》,第 278 页。

⑤ 王琼辑:《曲江亭闺秀唱和诗·序》,清嘉庆间刻本。

⑥ 聂欣哈:《清代闺秀论诗诗的性别文化启蒙》,《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6 期。

⑦ 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第三章,第 204 页。

⑧ 聂欣哈:《清嘉道年间女性的诗学研究》第三章,第 140 页。

⑨ 沈善宝:《名媛诗话》卷 11,《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1706 册,第 679 页。

⑩ 那逊兰保:《芸香馆遗诗》卷上,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⑪ 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卷 3,《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57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725 页。

⑫⑬ 徐世昌:《晚晴移诗汇》卷 188,《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1633 册,第 489、486 页。

⑭ 王继藻:《敏求斋诗》,郭润玉辑:《湘潭郭氏闺秀集》,清道光十七年刻本。

⑮ 完颜恂珠:《国朝闺秀正始续集》补遗,清道光十六年红香馆刊本。

⑯ 完颜恂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卷 15。

⑰ 陈芸:《小黛轩论诗诗》卷上,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 2 册,第 1527、1530、1531 页。

⑱ 陈荭:《小黛轩论诗诗叙附记》,《小黛轩论诗诗》卷首,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 2 册,第 1520 页。

代女性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亦直可“作妇女史或艺文志读”^①。

清代女性文学的繁荣是全方位的，体现在女性作家成批涌现、女性诗文集广被编刻、女性文学批评长足进步等各个层面，而女性文人组织大量集会结社既是清代女性文学繁荣的表征之一，与上述诸项共同映射出清代尤其是康乾以后女性文学的盛况，同时也是促进清代女性文学发展的动因之一。通过上述梳理，就女性结社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还可以得到如下两点认识。

一是女性社群创作的大量作品是清代女性文学批评发展的前提。创作是文学批评的前提，批评是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清代女性文学于此亦不例外。清代女性作品数量之多历来为世所公认，仅清人编选的清代女性诗歌总集就有将近 100 种，而在此之前，明代只有 30 余种，明前各代总和不足 10 种。^②至于单个女性的别集，数量更是难以确知，^③所可知者是清代很多女性群体都是人人有集甚或人有数集，如蕉园诗社诸子、清溪吟社诸子、阳湖张氏诸子、湘潭郭氏诸子等，莫不如是。所谓“女学昌明，闺彦淑媛，莫不挟册吟咏，颇有能蜚声词台，与须眉相颉颃”^④，并非虚言。而这些作品的产生大多与女性文学社群及其开展的文学活动密切相关。

二是诗社词社为女性结社的大宗与诗词是女性文学批评的主要范畴相互呼应。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创作一直以赋诗填词为主而古文时文甚少。究其因主要有二。其一，由中国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所决定。作为“执掌中馈”的家庭责任承担者，女性不需要参加科举考试、博取功名，也就没有写文章的动力，家庭教育也多不在这方面培养和督促她们，因而在本就不甚发达的女性文学史上形成了“闺阁有作，诗词多而文少”^⑤的局面。其二，诗词的抒情性文体属性更符合女性特质。相对于用来解经、说理、叙事的古文时文而言，诗词多用来言情抒怀、吟风咏月，且短小精练、韵律谐和，更切合女性温柔婉约的性别特质，更容易为女性文人所接受和偏爱，^⑥因此清代女性的文学创作是以诗词为主流。与之相对应，诗社、词社占据着女性文人结社的绝大多数，而所谓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也就主要是指诗词批评。

(责任编辑：张 曦)

Female Scholars' Associ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with the Female Literary Criticism i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LI Yushuan

Abstract: The association of female scholars in ancient China began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formally formed during the Kangxi period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continuously developed in Yongzheng and Qianlong, reached its peak between Jiaqing and Xianfeng, and rapidly declined after Tongzhi. In this process female scholars' associations have a clear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from blood relationship to regional relationship, and from teacher's relationship t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 large number of associations organized by female scholars is one of the symbols of the prosperity of female litera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litera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It has played a promot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fields of selected works, preface and postscript,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 and poetry commenting on poetry, etc.

Key words: association, female scholars, female literature, literary criticism, Qing Dynasty

① 郭绍虞、钱仲联、王遽常编：《万首论诗绝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4—5页。

② 参见刘启明：《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研究》引言，第1页。

③ 据初步调查，清代 3600 余名女性作家的作品曾经刊行，现存可知有 870 余人、900 种左右。参见张宏生：《古代妇女文学研究的现代起点及其拓展》，胡文楷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第 1206 页。

④ 胡文鉴：《历代名媛文苑简编序》，王秀琴编集，胡文楷选订：《历代名媛文苑简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年，第 2 页。

⑤ 胡文楷：《历代名媛文苑简编后序》，王秀琴编集，胡文楷选订：《历代名媛文苑简编》，第 2 页。

⑥ 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 年，第 17 页。